

编者按 水资源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自然资源。进入21世纪后,随着水资源稀缺性危机的加剧,水资源安全对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加明显,水资源安全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那么,水资源安全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地区环境?为何在21世纪水资源安全会成为国际研究热点议题?国内外国际关系领域的水资源安全研究有哪些进展?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中国学界的水资源安全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不足?未来应采取哪些积极举措推动中国学界水资源安全研究的深化?为此,本刊特邀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研究院刘磊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志斐。李志斐研究员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水资源安全与国际关系、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中国周边安全,著有《亚太地区水资源安全治理》《水与中国周边关系》《国际河流河口:地缘政治和中国权益思考》等。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水资源安全研究

——李志斐研究员访谈

李志斐 刘磊

一、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兴起

刘磊(以下简称“刘”):水资源安全议题是如何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李志斐(以下简称“李”):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是人

类文明起源的基础,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均诞生于水源丰富之地。水源丰富,土地才能肥沃,农业才能发展,人类才能得以繁衍生息,并逐渐兴起商业。公元前 4500 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两个城邦国拉什加和乌姆马之间因争夺河流用水而发生战争,自此之后,水问题就逐渐成为各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需要考虑的议题之一。

20 世纪 60 年代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直接推动了水议题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约旦河是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的主要水源地。1964 年以色列竣工完成约旦河河道改变工程——“国家输水工程”,截取了约旦河大部分水源,导致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规划河水改道工程。以色列为确保最大化用水权益,在 1965 年派出突击队对阿拉伯国家的约旦河改道工程进行破坏,成为引发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由头之一。在此次战争中,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夺去了约旦河和太巴列湖(地处戈兰高地,主要由约旦河上游的淡水注入而成)的控制权,并利用第四次和第五次中东战争占有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黎巴嫩南部领土,从而控制了约旦河流域的主要水源地。美国在斡旋平息中东国家纷争时,明确提出要把“水”问题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一把“钥匙”。

中东战争的几次爆发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水资源安全与国际冲突的高度关注。同时期,在尼罗河流域,埃及作为下游国家在《1959 年尼罗河协定》后修建阿斯旺大坝,建立了对河流水资源水分配的“霸权”,^①引发对尼罗河 86% 的水流量贡献量的埃塞俄比亚的极力抗争。^②此后,国家之间因为水利用和分配、协调管理等问题产生的纷争,使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将水资源安全与国家间关系、地区安全、地缘政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将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约旦河等中东地区的三大水系作为主要分析案例和对象。学者们试图通过大量深度的和系统的实证案例分析,来探寻水与国际冲突、合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将其作为分析国家间双边、多边关系发展和地区政治的重要视角。自此,水安全议题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刘:水资源是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的?

李:水资源之所以能够影响国际关系的结构状态,是与水资源本身具有的

^① Nora Hanke, “East Africa’s Growing Power: Challenging Egypt’s Hydro-political Position on The Nile?” March 2013, <http://scholar.sun.ac.za/handle/10019.1/80202>, 2023-02-02.

^② Rawia Tawfik, “Revisiting Hydro-hegemony from a Benefit-Sharing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the 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 Bonn 201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8209427_Revisiting_Hydro-hegemony_from_a_benefit-sharing_perspective_The_Case_of_the_Grand_Ethiopian_Renaissance_Dam, 2023-01-16.

三个特殊属性密切相关的。第一,数量的稀缺性。从水资源在整个地球的空间分布来看,地球上的水资源总量大约为14亿千立方米,其中97.5%为不适合饮用和灌溉的咸水,仅2.5%是淡水资源,约为3500万千立方米。在所有的淡水资源中,大约70%的水量,即约2400万千立方米集合在南极和格陵兰的冰山地区中。可供人类使用的总淡水资源量只有所有淡水资源的0.3%,大约10.5万千立方米;^①第二,分配的不均衡性。全球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60%的全球淡水资源集中在巴西、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等九个国家,而占世界人口总数40%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却严重缺水;第三,使用的不可替代性。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刚需”资源,没有其他资源可以替代。

随着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水资源稀缺性与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为了获取足够的水源供给,维护水资源安全,获取可以满足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足够的水资源,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在很多跨国界流域,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足够水源而发生纷争和冲突。因水引发的冲突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利用性冲突。在同一流域内,一国对共享水源的利用难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地处上游河段的国家兴建水电站、修改河道等,很容易引发下游国家的担忧、不满和抗议;第二,污染性冲突。一国造成的水质污染随着水流运动和扩散,导致其他国家连带性污染,引发国家间的矛盾和纷争;第三,分配不均衡性冲突。此种冲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相对性分配短缺冲突,指该流域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因水利开发力度与类型不同、季节性降水变化等因素导致国家之间利益竞争和协调困难,容易引发用水纷争和冲突;一种是绝对性分配短缺冲突,是指流域地区水资源天然匮乏,各国单边改善水危机困境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用水安全,引发水资源冲突发生。

水资源可以引发冲突,也可以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纽带”。受地缘政治环境、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传统国家间关系等因素影响,水合作具有层次性特点,分为协调(信息交流与共享)、协作(制定条约和行动规则)、联合行动(设立共同的管理机构)等三个层面。梳理从古至今的国家间水合作形式,可以发现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建立信息搜集和交流机制。国家之间定期交换数据和信息,或者交换影响国际水域水体或水环境的项目、规划、工程或活动的相关技术信息;^②第二类是签署水资源合作条约,包括全球性水条约(例如

^① Peter H. Gleick, *Water in Crisis: A Guide to the World's Fresh Water Resour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2.

^② 何艳梅:《国际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和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185页。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区域性水条约(例如欧洲的《关于跨境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和使用的公约》、非洲的《关于共享水道系统的议定书》)和流域性水条约。流域性水条约是目前国际水法的主体,双边或多边围绕流域水资源分配、利用和保护问题而签订。截至 2018 年,全球范围内已经签订了 400 多个跨界河流条约。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实施的流域水条约大约有 286 个,其中 2/3 在欧洲和北美洲。^① 水量分配和水力发电是水条约的两大主题,另外是洪水和污染控制、通航等。西欧、北美地区的水条约多以水污染和水质保护为核心议题,亚洲、非洲等地区多围绕水量分配而签订;第三类是成立流域组织机构。流域国家协商建立专门性的,以经常性委员会形式存在的组织机构,追求实现对流域水资源的综合、统一管理,例如湄公河委员会、莱茵河流域委员会、多瑙河流域委员会和保护易北河国际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功能通常包括监督条约执行情况;监测河流水量、水质和流域环境;调查水利设平台;协调成员国水争议等。

刘:在水资源安全研究中有无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主要内容是什么?

李: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水资源安全理论随着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最先形成的是“水冲突论”,主要是基于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水冲突发生的根源、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皮特·克拉克(Peter Gleick)、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阿伦·沃尔夫(Aaron T. Wolf)、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赫尔戈·哈夫滕多恩(Helga Haftendorn)等学者开始深入分析国家间发生水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影响因素,总结水资源成为国家间战略对抗来源的基本条件,通过全球水冲突等代表性事件分析,阐释水资源在国家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按照人类对水资源施加影响的过程,对水冲突的类型进行划分,并探讨如何预测和最大可能的预防水冲突发生。^② 在水冲突论中,比较有典型代表的是“水稀缺冲突论”,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T. H. 迪克森(Thomas F. Homer Dixon),他的论证基础是自然资源的天然有限性,认为水资源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人口的增长和资源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加剧环境的稀缺性,由此导致经济生产能力和规模下降和缩减,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迁移他处,进而加剧其他地区的环境竞

^① 《国际水条约》,中国水电网,2018 年 1 月 3 日,<http://www.hydropower.org.cn/showNewsDetail.asp?nsId=23011>,2022-12-12。

^② Peter Gleick, “Water and Conflict: Fresh Water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1, 1993; Aaron T. Wolf, “International Water Conflict Resolution: Lesson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Vol.13, No.3, 1997; Helga Haftendorn, “Water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1, 2000.

争,最终引发种族间冲突。同时,由于人口数量减少、社会内部发展压力增大,国家内部发生政变或社会冲突。^①

“水权力论”来源于水冲突论中的地缘政治分析,跨国界流域中上下游地理位置的差异,使流域国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上游国家可以将水资源占有的地理优势转化为一种战略优势,成为可以制约其他流域国的一种权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弗雷德里克·弗雷(Frederick Frey)博士和新泽西大学的米里亚姆·洛伊(Miriam Lowi)博士等学者通过分析中东地区水争夺中以色列的案例,认为上游国家如果是综合实力最强国,且水资源利益诉求相对较少,那么,流域环境就最稳定,下游国家如果想改变先天劣势而使用武力,去摧毁其他国家水基础设施来改变自己可能受到的“水威胁”现实。上游地区的流域强国的水权力对该地区能否实现水合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②

跨国界水资源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凸显,将其纳入国家和地区治理的政治框架中,发展出“水安全论”。世界银行专家戴维·盖瑞亚(David Greya)和斯里兰卡国际水治理所研究员克劳迪娅·塞道夫(Claudia Sadoff)对“水安全”定义进行界定,认为水安全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国家的基本水资源需求,使其具有稳定的数量和质量可靠的水资源供给,从而将水资源危机管控在一定范围内。^③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授施劳密·迪纳尔(Shlomi Dina)提出在“水安全复合体”中的“水安全困境”问题,认为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和共享的水文联结使跨国界流域形成一个环境、经济、政治和安全相互依存的“水安全复合体”,一国的水资源利用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流域国。随着水资源稀缺性加剧,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趋势会进一步凸显,如果一国单方面谋求更多水资源,有可能会地区水冲突。^④山东大学的李昕蕾教授和华冉博士认为,水冲突和水合作事件相互影响推动跨国界流域形成水安全复合体,它具有高度安全化的特征,包括水威胁识别(安全化过程)、水合作程度(技术—政治互

① Thomas F.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Fall 1994.

② Frederick W. Frey, “Middle East Water: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 Thomas Naff and Ruth C. Matson, eds., *Water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Westview Press, 1984, Miriam Lowi, *Water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a Scarce Resource in the Jordan River Bas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David Greya and Claudia W. Sadoff, “Sink or Swim? Water Security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ater Policy*, Vol.9, No.6, 2007.

④ Shlomi Dinas, “Water, Securit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SAIS Review*, Vol.22, No.2, 2002.

动进程)和水事件历时性演进这三个维度。^① 南京大学的华亚溪博士和郑先武教授认为,水安全复合体是多元行为体互动和多重安全领域互动共同作用而形成,按照安全治理有效性从低到高可以分为潜在水安全复合体、水安全复合体—利益体系平衡、水安全复合体—区域制度和水安全共同体四个阶段。^②

20 世纪 90 年代后,“霸权稳定论”经过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rohane)、乔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等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完善之后逐渐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研究。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杰瑞恩·瓦纳(Jeroen Warner)提出“水霸权论”。该理论认为,在跨国界流域,流域强国通过建构强制性、功利性、规范性和意识形态性等四种水霸权形式,实施水资源控制和遏制战略。流域国可以通过建构“积极性水霸权领导”形式来保证流域秩序、地区稳定和水量的公正分配,从而降低地区冲突发生的概率。^③

欧洲一体化进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取得重大进展。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间合作在规范统一、规则建立、合作管理等方面树立起国际河流合作的成功典范形象。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1992 年通过的《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和欧盟通过 2000 年的《水框架指令》,这为欧洲跨国界水资源合作建立起法治保障体系。欧盟水合作的成功推动了国际学者们对水合作议题的研究,通过对案例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开始从制度主义视角研究和探索水资源条约签署、合作机制和联合管理机构建立的条件和关键性因素,寻求如何更多地通过促进水合作来减少地区冲突等。

“水合作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水合作机制论”和“水资源一体化管理论”。目前,学术界关于水合作机制的探讨还主要集中于水合作条约的签署,这也是机制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④ 所以,加拿大国际水资源联合会戴维·以勒马昆德(David G. LeMarquand)博士、什洛米·迪纳尔(Shlomi Dinar)教授、

① 李昕蕾、华冉:《国际流域水安全复合体中的安全秩序建构:基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冲突—合作事件的分析》,《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

② 华亚溪、郑先武:《澜湄水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治理机制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6 期。

③ Jeroen Warner, “The Politics of Diversion-Bridging Troubled Water in the Middle East,” Master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Netherlands, 1992; Mark Zeitoun and Jeroen Warner, “Hydro-Hegemon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 *Water Policy*, Vol.8, No.5, 2006; Ian S. Lustick, “Hegemony and the Riddle of Nationalism: The Dialectics of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East,” *Logos*, No.3, 2002.

④ Nurit Kliot and Deborah Shmueli,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Management of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Vol.1, No.3/4, 2001, p. 307.

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大学珍妮弗·宋(Jennifer Song)博士和戴尔·惠廷顿(Dale Whittington)博士、美国国际研究联合会安德烈·格拉克(Andrea K. Gerlak)博士和基思·格兰特(Keith A. Grant)博士等从地缘政治结构、国家实力对比和国家政体等角度分析影响水合作条约签署的影响因素和所需条件,认为国内层面上包括官僚政策进程、政策执行过程和利益政策联盟等因素,国际层面不仅包括外交政策方面的国际形象、国际法律法规、互惠和议题联系等因素,还包括流域因素。例如,水资源匮乏和相互依赖程度,管理和治理问题、历史冲突和权力差异等。^①

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理论源于欧盟1992年通过的《都柏林原则》,核心观点是将跨国界流域视作一个整体系统,流域国之间对共享水资源进行合作管理,协调规划整个流域水资源的水能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流量控制等,在平衡和保护流域各国的水资源需求权利的同时,实现对流域水资源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性利用。^②在一体化管理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提出了水合作管理理论和水多层治理理论,强调水资源管理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维度,要通过加强综合合作和推动新的多层治理机制建设,尤其是推动建立覆盖全流域的水资源合作机制,促进区域水资源安全的善治。^③

20世纪90年代末期,通过对水事件的大量样本和案例分析,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克·蔡图恩(Mark Zeitoun)、日本东京大学纳昂·米卢马奇(Naho Mirumachi)博士等学者提出了“冲突—合作共存论”,认为在同一个流域中,水冲突和水合作可以共存并渐进演变,分为积极性共存(低冲突—高合作)、中度共存 I(低冲突—中等合作)、中度共存 II(低冲突—低合作)和消极性

① David G. LeMargu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enegal River," *Water International*, Vol.15, No.4, 1990; Sholmi Dinar, "Water, Securit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Sais Review*, Vol.XXII, No.2, Fall 2002; Sholmi Dinar, "Scarcity and Cooperation Along International River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9, No.1, 2009; Jennifer Song and Dale Whittington, "Why Have Some Countries on International Rivers Been Successful Negotiating Treat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Vol.40, No.5, 2004; Andrea K. Gerlak and Keith A. Grant, "The Correlates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ivers," in Thomas Volgy, et al., eds, *Mapping the New World Order*, Mapping the New World Order, Malden, MA: Wildy-Blackwell, 2009.

② See Muhammad Mizanur Rahaman and Olli Varus,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Evolution, Prospec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 Policy*, Vol.1, No.1, 2005, pp. 15-21; Adil Al Radif,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WRM): An Approach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xt Century and to Avert Future Crises," *Desalination*, Vol.124, No.1-3, 1999, pp. 145-153.

③ 朴键一、李志斐:《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郭延军:《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多层治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

共存(中/高冲突—低合作)四种方式。^① 沃尔夫教授将水事件划分为 15 个风险等级,0 到-7 到为 7 个冲突等级,0 到+7 为 7 个合作等级,0 代表中性,冲突和合作会进行阶段性转化,转化阶段可以分为敌对性阶段、反思性阶段、整合性阶段和行动性阶段,影响阶段性特征的因素包括共同的水要求、协调能力和地缘空间。^② 英国皇家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扎奥尼茨(Mark Zeitoun)和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纳昂·米卢马奇(Naho Mirumachi)等建构了跨国界水互动轴模型(Transboundary Waters Interaction Nexus, TWINS),将水冲突划分为非政治性冲突、政治学冲突、安全化冲突和暴力性冲突四个级别,将水合作划分为议题应对性合作、偶然性互动、技术合作、风险规避性合作和风险承担性合作五个等级,在该模型中根据冲突—合作的等级混合程度划为 A 时期冲突—合作域、B 时期冲突—合作域和 C 时期冲突—合作域,不同时期的合作域场变化显示出冲突—合作互动的历史性动态演变。^③ 跨国界水互动轴模型反映了水资源安全治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描绘出水冲突—合作共存合作的复合体模式,超越了水冲突和水合作的单维或二维式分析方法,推动了学术界对水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维式分析和动态性认知体系建立,促进了水资源安全治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通过梳理水资源安全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水资源安全理论是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领域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并随着时代格局变化、地缘政治发展和全球治理需求而不断“与时俱进”。从理论内涵和发展趋势上讲,21 世纪后形成的水资源安全理论将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现实利益导向、制度红利、认知建构等内核都糅合进去,力图为认知和探索全球、地区、国家等不同层面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与治理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和路径。就此而言,水资源安全理论从“水与国际关系”这一分支领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建构。

① Mark Zeitoun and Naho Mirumachi, “Transboundary Water Interaction I: Reconsidering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Vol.8, No.4, 2008.

② Aaron T. Wolf, “Healing the Enlightenment Rift: Rationality, Spirituality and Shared Wa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1, No.2, 2008.

③ Naho Mirumachi and J. A. Allan, “Revisiting Transboundary Water Governance: Power,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aptive and Integrated Water Management, Basel, Switzerland, November 12-15, 2007.

二、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国内外发展

刘:进入21世纪后,水资源安全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热点研究议题,其原因是什么?

李:进入21世纪后,水资源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热门研究议题,主要的推动因素有三个。

第一,水资源危机的加剧。气候变化和全球人口增长促进水资源供需之间的进一步失衡,水资源稀缺性加剧。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发布的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强调,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事实,它深刻影响全球的资源与环境,改变水资源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水危机。^①现在,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正在以每年640亿立方米的速度增长,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发布《2021年气候服务状况:水》报告强调,截至2018年,全球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的用水量严重不足,这一数字预计到2050年将突破50亿人,共有107个国家无法实现到2030年可持续管理其水资源的目标;到2020年,仍有36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服务,23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服务,超过20亿人生活在缺水的国家,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②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结合全球气候模型和社会经济情景测算各国地表水的竞争情况发现,到2040年,33个国家将面临极高水资源压力,其中有14个位于中东地区。^③水资源短缺影响了全世界40%人口的基本生活与生产,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估计将有7亿人因严重缺水而流离所。^④水资源稀缺性危机的现实和日益加重的趋势,驱使着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人们更加重视水资源安全的研究和治理路径的探寻。

① IPCC, "Working Group II Contribution to the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http://www.ipcc.ch/report/ar5/wg2/>, 2022-11-10.

② WHO, "Billions of People Will Lack to Safe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 2030 Unless Progress Quadruples-Warn WHO, UNICEF," July 1, 2021, <https://www.who.int/news/item/01-07-2021-billions-of-people-will-lack-access-to-safe-water-sanitation-and-hygiene-in-2030-unless-progress-quadruples-warn-who-unicef>, 2022-12-25.

③ 《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2040年国家水资源压力排名》,世界资源研究所,2015年8月26日, <https://wri.org.cn/insights/ranking-worlds-most-water-stressed-countries-2040>, 2022-11-22.

④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development-agenda/>, 2022-12-27.

第二,水资源安全冲突增多增加地区更多不稳定性。水资源稀缺性危机的加剧会引发连锁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安全效应,严重影响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地区或国家冲突的诱因。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12—2022年的年度《全球风险评估报告》中,水资源安全问题连续十年被列为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高风险问题之一。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跨国界流域,例如,印度河流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格纳河流域、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约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等,流域国之间的水资源利用纷争和冲突持续不断,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突出安全问题。在中东地区,水资源安全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2017年4月,德国阿德菲(Adelphi)智库发布的《全球变暖环境下的暴乱、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报告显示,恐怖组织会将水资源作为“战争武器”,通过控制水源,迫使人们服从其领导,在水资源越是稀缺的地方,恐怖组织的控制力就越大。^①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发展壮大就与该地区的水资源安全问题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控制水利基础设施来扩大地区势力和“地盘”占领。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水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辩论的焦点。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大了对跨国界河流的开发利用,引起了周边国家与中国在水量分配、水质污染、水能开发、水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与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纷争,水资源安全问题在中国周边密集爆发,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安全等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关系与安全环境构建的一个重要安全性问题。另外,中国对外水利投资“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参与投资与合作建设大量水电站、水坝等水利基础设施,引发了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水利投资行为的关注。西方媒体、部分非政府组织联合鼓吹和宣扬“中国水威胁论”“中国大坝威胁论”,认为中国在水资源安全问题处理中,利用自己的天然地理优势,单纯顾及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实力发展,忽视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国水利开发的国际影响、中国水资源安全战略等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讨论的热点。

第三,水治理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治理的重要国际议题。水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但水治理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1998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就意识到改善水治理的迫切性,提出对全球淡水资源情况开展定期评估的建议。2003年负责协调联合国框架下涉

^① “Insurgency, Terrorism and Organised Crime in a Warming Climate,” <https://www.climate-diplomacy.org/publications/insurgency-terrorism-and-organised-crime-warming-climate>, 2022-12-22.

水事务的专门机构——联合国水机制(UN-Water)建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年度性《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WWDR)。年度报告密切关注全球日益严重的水问题,阐述水资源产生影响的跨学科问题,如能源,气候变化,农业和城市发展,并对如何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淡水资源提出相关建议。报告不仅直接影响联合国框架下水治理行动的开展和规划,更广泛提升了全球各国民众对水治理必要性的认知与水治理行动的支持。

2015年9月,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个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建设的复合型议程,^①水治理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除了水与环境卫生领域的目标6“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和具体细化的8个子目标外,还有其他领域的5个目标中设置了水治理相关内容,即粮食安全、健康生活、能源安全、性别平等、气候变化、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等,涵盖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各国和国际社会指明了未来15年的发展与合作方向,影响着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参与行动。如何更好地对接2030年发展目标,推动水治理政策完善和行动实施,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内容。

刘: 国外的水资源安全研究有哪些进展?

李: 国外的水资源安全研究起步较早,主要的研究理论均源于欧美学者研究。前文所阐述的“水冲突论”“水霸权论”和“水合作论”等理论,均为国外学者首先提出,在此就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就欧美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期刊和代表性学者做一梳理。

在研究机构与平台搭建方面。总体来说,欧美国家非常重视水资源安全研究,尤其是在欧洲,将环境作为外交三大支柱之一,因此,普遍重视水资源安全理论和政策类研究,对项目开展、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等方面都投入较充足的资金、人力和政策支持。对水资源安全研究比较重视且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代表性研究机构有以下几个。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地球、海洋和水文科学学院(College of Earth, Ocean,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CEOAS)对水与国家间冲突做了很多基础性研究。该学院水资源安全研究主要包括水政策与冲突管理、气候与社会和水科学等,其中,水冲突与冲突管理专业是采取综合方法,在治理与可持续框架

^①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l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zfzyc_686343/t1331382.shtml, 2022-12-22。

下探究水资源的人文、政治和科学维度,寻求水冲突转化的各种路径,包括水利外交、冲突解决、公众参与和公共政策与法律。^① 学院还建立了跨边界淡水争端数据库(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 TFDD),汇总和分析全球水相关事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水与国际冲突、合作的内在关系与影响因素。美国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是与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知名智库,军事背景浓重,其研究对美国政府的地区安全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水资源安全领域尤为突出。中心设立的东亚研究和能源、水和可持续研究项目组等将湄公河地区的跨国界河流事宜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影响美国政府湄公河地区政策的制定,其主持的湄公河联结(Mekong Basin Connect)、湄公河大坝监测(Mekong Dam Monitor)、湄公河基础设施跟踪(Mekong Infrastructure Tracker)、湄公河政策工程(Mekong Policy Project)、湄美伙伴关系 1.5 轨政策对话(Mekong-US Partnership Track 1.5 Policy Dialogue)等评估、数据检测、对话交流项目,直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湄公河政策实施。^②

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在全球 12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工作范围辐射 50 多个国家,尤为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治理和可持续利用工作,设有水资源安全项目部门,强调其地区办公室的目标内容之一就是对接所在国和区域的发展战略,通过翔实研究和数据资源指导,推动绿色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世界资源报告》等研究报告、问题简报、工作文件和指南等,对于学术界的水资源安全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③ 美国国际河流网(International River Network, IRN)成立于 1985 年,专注于国际河流上水利工程项目的实施、信息监测、环境评估和保护等,跟踪相关流域国家的水利、能源政策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投资动态,发布相关调研和分析报告,为国际学术界开展水资源安全提供参考。^④

瑞典斯德哥尔摩水资源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SIWI)是国际知名的专注水科学研究的专业和政策性研究所,主要在水治理、跨国界水资源管理、水和气候变化、水—能源—粮食纽带、水利经济学等五个领域开展研究,定期出版水资源和相关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论文和简报,参与全球和地区水监测和评估,并协助《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撰写,每年组织世界水周和各类水会议,汇集全球各国和国际组织、各领域专家学者开展研

① College of Earth, Ocean,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https://ceoas.oregonstate.edu/wate>, 2022-12-22.

② The Stimson Center, <https://www.stimson.org/>, 2022-12-22.

③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https://www.wri.org/>, 2022-12-22.

④ 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 <https://www.irn.org/>, 2022-12-22.

讨,积极影响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水治理决策。^①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又称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致力于为全球挑战提供应对之策,将建立和平、可持续、包容性社会列为世纪目标,研究议题包括防卫与安全、经济和贸易、环境、健康、政治和法律等领域。研究所的水资源研究是从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国家关系、水—能源—粮食纽带等视角开展综合性研究,其中,亚太和非洲是重点关注地区。^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在安全和国际事务方面开展学术和政策相关研究,研究领域涵盖全球、地区、国家层面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学院设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TS Centre)对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环境保护、海洋安全等进行开创性研究,已有的水资源安全研究成果多从中国政策的视角探讨。^③

在期刊建设方面。在国外刊发国际关系视角的水资源安全研究论文的期刊,既有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类期刊,也有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研究类期刊。《水文杂志》(*Journal of Hydrology*)是一本主要刊载水文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的期刊,同时发表关于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治理政策的研究论文。^④ 《国际水资源》是国际水资源研究所(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IWRA)的旗舰期刊,重点刊发水治理、政策和管理的研究成果。^⑤ 《水资源》关注水资源评估、水资源综合利用、水质和环境保护等方向的学术论文,涵盖多研究领域。^⑥ 《国际水资源发展》支持政策和应用型文章发表,关注全球水资源规划、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最新进展,致力于推动现实水问题的解决。^⑦ 《水政策》是专门的针对全球范围水政策思考和研究的期刊,包括政策制定、外交、行政、财政、法律和技术/科学等不同领域,涵盖国别、区域和全球不同层面的水

①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https://siwi.org/>, 2022-12-22.

② Chatham House, www.chathamhouse.org/, 2022-12-22.

③ RSIS, <https://www.rsis.edu.sg/>, 2022-12-22.

④ *Journal of Hydrology*,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journal-of-hydrology/about/aims-and-scope>, 2022-12-22.

⑤ *Water International*, <https://www.iwra.org/water-international/>, 2022-12-22.

⑥ *Water Resource*, <https://www.springer.com/journal/11268>, 2022-12-22.

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https://www.tandfonline.com/action/journalInformation?show=aimsScope&journalCode=cijw20>, 2022-12-22.

相关研究,曾刊登过多篇水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文章。^① 随着水资源国际纷争的增多和地区效应的不断凸显,近些年这些经常会刊载国际关系视角下国家河流政策与行为分析、水资源治理与国际合作、水外交等相关的论文,深度分析论述河流争端与合作所引发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影响。^② 环境类期刊也日益重视水资源安全机制相关理论的探讨。例如,《国际全球环境问题》《环境与发展》和《全球环境政治》等,也都是水资源安全研究性论文发表的重要刊物。^③

《国际安全》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顶级权威期刊,是较早开始探讨水资源与国际冲突等相关理论研究的期刊。^④ 国际研究协会的旗舰期刊——《国际研究》季刊在推动水资源安全理论、治理和相关政策研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⑤ 《第三世界》季刊主要研究第三世界问题,亚太地区、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安全问题是其重视的议题。《当代中国》主要刊载关于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政策类研究文章,中国的跨国界河流问题也是近年来发表的

① Mark Zeitoun and Jeroen Warner, "Hydro-Hegemon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 *Water Policy*, Vol.8, No.5, 2006; Mark Zeitoun and J. A. Allan, "Applying Hegemony and Power Theory to Trans-boundary Water Analysis," *Water Policy*, Vol.10, No.2, 2008; Anthonh Turton, "Hydro-Hegemony in the Context of the Orange River Basin," *Water Policy*, Vol.10, No.2, 2008.

② Seungho Lee, "Benefit Sharing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Water International*, Vol.40, No.1, pp. 139-152; Xiuli Han, "Approaches to Investment in Chinese Trans-boundary Waters," *Water International*, 2015, Vol.40, No.1, pp. 71-86; Jessica M. Williams, "Is Three a Crowd? River Basin Institutions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Mekong Riv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Jan. 07, 2020; R. Edward Grumbine, "Using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o Manage the Mekong Rive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Vol.34, No.5; Thai Hoanh, "Water Productivity Responses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Lower Mekong Basin," *Water International*, Vol.37, No.1, January 2012; Michele Staubli, "Water Diplomacy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Mekong: From Rivalries to Cooperation," *Journal of Hydrology*, Vol.567, December 2018.

③ Nurit Kliot and Deborah Shmueli,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Vol.1, No.3, 2001; Andrea K. Gerlak,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nd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rrangements in the Danube River and Black Sea Reg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Vol.13, No.4, 2004; Shlomi Dinar, "Scarcity and Cooperation Along International River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9, No.1, 2009.

④ Peter Gleick, "Water and Conflict: Fresh Water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1, 1993.

⑤ Ken Conca, et al, "Global Regime Formation or Complex Institution Building? The Principled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River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0, No.2, 2006; Marit Brochmann and Paul R. Hensel, "The Effectiveness of Negotiations over International River Clai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3, 2011.

重要议题。^①《当代东南亚》重点关注东南亚国家国内政治、国际事务和地区安全问题,水资源安全问题是近年来比较关注的议题之一。^②

在研究队伍方面。国外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以下几位。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阿伦·沃尔夫教授对于国际水资源安全理论建设和创新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建构了基本的水资源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基础性逻辑分析框架,提出发展水资源合作是避免冲突的重要路径。^③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什洛米·迪纳尔教授是水资源安全的“领军”人物,主要研究国际水政治、气候变化与国际水问题、水问题与恐怖主义等议题,著有《国际水条约:跨界河流的谈判与合作》《国际水资源短缺与变异性:跨政治边界管理资源使用》等,这些研究主要从国际法、国际谈判、边界治理等视角分析水资源冲突与合作。^④美国乔治城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马库斯·D.金(Marcus D. King)教授作为美国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专家,长期跟踪关注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安全议题,目前研究重点是水资源短缺和大规模暴力的关系,著有《中东水与冲突》《水武器:水压力和非洲、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暴力》等。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是印度著名的地缘战略家,对于自然资源地缘政治在内的全球战略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性、跨学科视角的研究分析,其两本著作《水:亚洲新战场》和《水、和平与战争:直面全球水危机》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力很大,对亚洲的水政治,水与亚洲地区和平、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⑤并分析日益严重的全球水资源压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阐释了水战争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影响。^⑥

① Selina Ho, "River Politics: China's Policies in the Mekong and the Brahmaputr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3, No.85, 2014; Sebastian Biba, "Desecuritization in China's Behavior towards Its Trans-boundary Rivers: the Mekong River, the Brahmaputra River, and the Irtys and Ili Riv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3, No.85, 2014.

② Timo Menniken, "China's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9, No.1, 2007.

③ A. T. Wolf, et al., "International Water: Identifying Basin at Risk," *Water Policy*, Vol.5, 2003; Shira Yoffe, et 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Over 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Resource: Indicators of Basins at Ris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Water Resources Association*, 2003.

④ Shlomi Dinar, "Dams, Terrorism, and Water Nationalism'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 Asia,"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34, No.5, 2022; Shlomi Dinar, "A Global Analysis of Water-Related Terrorism 1970-2016,"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33, No.6, 2019; Shlomi Dinar, "Do Treaties Matter? Climate Change, Water Variability, and Cooperation Along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69, March, 2019.

⑤ Brahma Chellaney, *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⑥ Brahma Chellaney, *Water, Peace, and War: Confronting the Global Water Crisis*,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塞巴斯提亚·比巴(Sebastian Biba)博士擅长从水政治视角分析中国外交政策,长期跟踪研究中国的澜湄政策和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之间的水资源安全关系。^①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何秀玲(Selina Ho)博士从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水利基础设施投资和水资源政策。^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吴逢时(Fengshi Wu)副教授专注于环境政治和全球治理的研究,跨国界水资源是研究议题之一,曾主编《中国对全球资源的追求:能源、粮食和水资源》,从地缘政治、国内机制和全球治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跨国界水资源的利用与政策。^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张宏洲(Zhang Hongzhou)致力于地区和全球资源冲突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注重从中国国内政策角度分析中国水外交政策、行为和 international 影响。^④

刘:中国水资源安全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

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水资源安全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与西方同行相比,研究起步较晚。在2000年以前,水资源安全研究还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视角多为生态与环境安全。进入21世纪后,国内的水资源安全研究在研究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研究深度与广度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

第一,在研究机构建设方面。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原亚洲国际河流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开展跨国界水资源安全问题的学术机构,它

① Sebastian Biba, "China's 'Old' and 'New' Mekong River Politics: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from a Comparative Benefit-sharing Perspective," *Water International*, Vol.43, No.5, 2018; Sebastian Biba, "The Goals and Reality of the Water-Food-Energy Security Nexus: The Case of China and Its Southern Neighbou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No.1, 2016.

② Selina Ho, "Power Asymmetry and the China-India Water Disputes," in T. V. Paul, ed., *The China-India Rivalry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8; Selina Ho, "A River Flows Through It: Transboundary Waters in China-India Relations," in Kanti Bajpai, et al., eds., *China-India Relations: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Routledge, 2016; Selina Ho, "The Role of Ideas in the China-India Water Dispu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2, 2019; Selina Ho, "River Politics: China's Policies in the Mekong and the Brahmaputr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Vol.23, No.85.

③ Zhifei Li and Fengshi Wu, "China and Shared Water Resources: Geopolitics, Domestic Institu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Fengshi Wu, ed., *China's Global Quest for Resources: Energy, Food and Water*, Routledge, 2017.

④ Hongzhou Zhang and Mingjiang Li, "China's Water Diplomacy in the Mekong: A Paradigm Shift and the Role of Yun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Water International*, Vol.45, No.1, 2020; Hongzhou Zhang and Mingjiang Li, "Water Diplomacy and China's Bid for Soft Power in the Mekong," *China Review*, Vol.21, No.4, 2021; Hongzhou Zhang and Mingjiang Li, "A Process-based Framework to Examine China's Approach to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Vol.34, No.5, 2018.

成立于2000年。以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国际河流为研究主体,重点开展跨境资源环境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创立了国际河流与跨境水资源及生态安全研究基础理论体系,发展了国际河流科学。^①研究院的何大明教授和汤奇成教授合著的《中国国际河流》是国内对中国跨国界水资源进行全面介绍的第一本著作。何大明教授和冯彦教授合著的《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协调管理》是国内第一本对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管理进行系统分析的著作。学院对西南国际河流、东南国际河流的国际共同保护、开发利用、合作管理等进行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虽然该学院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个人、地方和国家与自然界关系的视角来分析国际河流安全问题,但为国际关系领域从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层面开展水资源安全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澜湄次区域研究的“重镇”。澜湄水资源安全问题是其重要的研究议题。学院的科研团队承担了国家政府部门和决策机构的大量应用性课题,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等诸多研究项目,从水资源安全管理、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澜湄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推动水资源安全的基础与应用性研究。武汉大学的边界与海洋学院是国内涉边海问题研究的智库,主要是从边界和国际水法角度开展跨境水资源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立足于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从中国周边关系、地区合作机制、美欧亚太安全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视角,在国别和地区研究层面开展水资源安全研究。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面向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在国别、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非传统安全工作,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水资源问题是其重要研究议题。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是外交部指定的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和中日韩思想库网络的中国国家协调单位,直接配合外交部东亚区域合作工作,承担了澜湄合作机制等大量研究和培训工作,在水资源安全研究中重点关注澜湄水资源管理和合作机制完善的问题。

第二,在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成果方面。较早从国际关系视角开展水资源安全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家枢教授,提出水安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政

^① 《填补研究空白 服务地方发展》,《云南日报》2021年8月7日, http://ynrb-h5.yndaily.com/#/detail/paper/55603_paperid_55603.2022-12-16。

治问题。^①此后国内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中东、^②中亚、^③中俄边境^④等水冲突较为典型的区域,试图建构起水资源与地区安全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央党校张泽的博士毕业论文《国际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是国内国际关系领域第一篇以国际水资源安全为题的学位论文,他对国际水资源安全的概念、冲突与合作,以及国际水法等内容进行了厘清和系统性阐释,其对国内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学术贡献值得充分肯定。2010年,湄公河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发生严重干旱,美西方国家炒作国际舆论,臆造出“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水威胁论”等攻击中国论调。国内学界为此对水资源安全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涌现出了一批关注和开展水资源安全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成规模、系统性的研究态势逐渐凸显。

现在,国内的水资源安全正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初步形成了以中青年专家为主的研究团队。学者们或者是将水资源安全纳入已有的研究领域,或者是将水资源安全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和议题,对其进行长期和持续性跟踪研究。在水资源安全理论研究方面,山东大学李昕蕾教授对跨国河流治理机制和路径、国际流域水安全复合体等相关理论开展了总结性和创新性的研究;^⑤山西大学副教授韩叶将规范竞争理论运用于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研究。^⑥本人从气候变化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并撰写了系列研究论文。^⑦上海政法大学何艳梅教授、武汉大学孔令杰教授、河海大学王志坚副教授等学者从国际水法视角研究国际河流争端与解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研究员侧重于从水—粮食—能源关联性视角开展水资源安全研究。^⑧

在地区性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方面,云南大学卢光盛教授和吕星副教授、

① 其中观点参见王家枢:《水资源与国家安全》,北京:地震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宫少鹏:《阿以和平进程中的水资源问题》,《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

③ 李立凡、刘锦前:《中亚水资源合作开发及其前景:兼论上海合作组织的深化发展战略》,《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冯怀信:《中亚水资源合作开发及其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4期。

④ 王志坚、翟晓敏:《我国东北国际河流与东北亚安全》,《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4期。

⑤ 李昕蕾:《冲突抑或合作:跨国河流治理的路径和机制》,《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李昕蕾:《国际流域水安全复合体中的安全秩序建构:基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冲突—合作事件的分析》,《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⑥ 韩叶:《国际河流规范竞争下的水资源分配》,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⑦ 李志斐:《气候变化与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李志斐:《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

⑧ 何艳梅:《国际水资源利用和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和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孔令杰:《国际水道相关国际判例研究》,《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王志坚:《国际河流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于宏源、李坤海:《中亚“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困境、治理及中国参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1期;于宏源:《水资源—粮食—能源的发展纽带和生态文明建设新趋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0年第6期。

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张励、外交学院郭延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任娜副研究员和邢伟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的屠酥副教授等学者集中于澜湄地区水资源安全研究；^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蓝建学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周章贵研究员等学者对南亚地区水资源安全，尤其是中印跨境河流水争端问题开展了很多创新性研究；^②在中亚水资源安全问题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李立凡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赵玉明副研究员和兰州大学焦一强教授等是代表性学者；^③浙江师范大学的张瑾博士和中央对外联络部张凯博士对非洲地区的水资源安全和水治理给予了更多专门性研究。^④

第三，在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国内水资源安全研究整体上重视现实性问题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样化、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与深化的鲜明特点。国内学者们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从地区政治、国际法、大国博弈、双边关系、周边安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不同视角，阐述和分析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以及其所产生的安全效应和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围绕前沿问题把握和国家战略需要，国内水资源安全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五方面。第一，地区性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澜湄地区水资源安全合作、中亚水资源冲突与地区影响、非洲跨国界河流开发与争端、南亚地区水资源安全尤其是中印跨国界河流争端等议题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着力研究的重点；第二，大国博弈与水资源安全。中美等大国竞争直接影响着地缘政治环境和地区关系发展，水资源安全问题与权力政治相结合，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研究大国竞争与地区性水资源安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是目前国内学者比较重视的一个视角和议题；第三，气候变化如何水资源安全。论证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水资源安全，如何引发连锁性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议

① 卢光盛、宋雨纯：“双向嵌入”视角下美国对湄公河水资源问题的介入》，《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2期；吕星、王万英：《湄公河水资源利用问题再认识》，《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郭延军：《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多层治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郭延军、任娜：《湄公河地区水援助：发展趋势与中国对策》，《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屠酥：《澜湄水资源安全与合作：流域发展导向的分析视角》，《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邢伟：《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下的水资源安全治理》，《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

② 蓝建学：《水资源安全和中印关系》，《南亚研究》2008年第2期；余潇枫、周章贵：《中印跨界河流非传统安全威胁识别、评估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

③ 李立凡、陈佳骏：《中亚跨境水资源：发展困境与治理挑战》，《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赵玉明：《中亚地区水资源问题：美国的认知、介入与评价》，《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3期；焦一强、刘一凡：《中亚水资源问题：症结、影响与前景》，《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④ 张瑾：《非洲水问题及其治理》，《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2期；张凯：《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0期。

题,最终会导致何种地区效应和社会影响,是国内水资源安全研究的重要视角和内容;第四,国家战略与水资源安全研究。中国决策部门日益重视主动型开展水外交,如何更好地制定和完善水外交战略与政策,是智囊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展开对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水外交的研究工作。从国家战略层面研究水外交和水资源安全战略,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

刘:中国水资源安全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李: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水资源安全作为一门融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性学科,在研究力度、宽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还存在需要加强之处。

在研究力量方面。自2010年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开展中国水资源安全研究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力量虽然有了显著性增多,但持续性跟踪力量薄弱,大部分研究者是基于当下水资源安全议题的热度而开展的短暂性、临时性研究,缺乏长期跟踪和关注的态度和力度。

在研究水平方面。从整体来看,学术界对于水资源安全的研究还缺乏高度、广度和深度。首先,地区间关注度差异明显。国内学者对南亚、中亚、东南亚地区的水资源安全给予了更多关注,而对东北亚、北亚等其他亚太地区、非洲、中东等地区的水资源安全问题极少涉猎;再次,理论创新能力较低。理论研究少,现实性研究多。相比较于国外学术界,国内对水资源安全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国外相关理论的梳理、归纳和分析,缺乏自我创新能力。

在研究路径和方法方面。第一,学科知识狭窄。水资源安全议题研究过程中需要涉及水文学、工程学、气象学、地理学、环境科学、农业和渔业等多个学科领域。但从目前国内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缺乏对水文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了解,缺乏对基础性、支撑性的数据信息的掌握和运用,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单纯地利用国际关系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割裂”了水资源安全的自然科学性,由此导致论证过程缺乏科学支撑和定量分析,研究结论单一,趋势判断误差较大,理论创新能力不足;第二,缺乏实证研究、实地调研与一手信息资料支撑。水资源安全研究往往涉及多个国家的国情、民情、政策等相关知识,需要通过实地调研、专业访谈等方法来进行一手数据信息搜集,尤其是边境地区和国别调研必不可少,同时还需要访谈他国影响水资源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相关人士,以深度了解政策本质、制定过程和实施措施等。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绝大部分的学者进行的都是所谓的“案头调研”,即从互联网、数据库等路径获取写作资料,很多政策和引用数据来源于“二手”资料,而不是选择从政策发布方或数据源头单位获取,导

致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趋同,论证过程重合度大,严重缺乏创新;第三,研究重现实,轻理论。国内对水相关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于现实性水资源安全问题现状、成因、影响和对策的分析,研究目标多定位于现实应对路径的寻找,而非新研究理论的创新和发现。

在国际交流对话和影响力方面。国内的水资源安全研究与欧美等地区和国家的交流和对话整体上还非常欠缺,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严重不足。目前很多涉及中国水资源安全的研究成果都出自国外学者之手,大量的相关国际会议都缺少中国学者的参与,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政策、行动的认知严重偏颇,甚至与客观事实严重背离,其不客观的解读严重误导了同行研究和相关政策制定。由于缺乏交流和对话,中国学者的声音和专业见解很少被国外同行了解,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严重不匹配。中国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影响力严重不足,是目前国内学术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亟需着手解决的课题。

三、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

刘:国内外学术界对水资源安全研究趋势是什么?

李:国内外学术界对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点。第一,研究热度将持续增加。一是受气候变化和人口不断增加的影响,全球水资源危机加重,全球水资源供应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危机所造成的连锁性自然影响、社会影响、政治影响和安全影响将持续显性增加,由此所引发的国内动荡、地区冲突将进一步危及全球安全与发展。所以严峻的国际现实会促使国内外学界加强对水资源安全的研究。

第二,研究内容和视角将更加丰富与多样化,研究深度和广度将持续深化与扩展。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安全的影响、跨国界水资源冲突与合作、跨国界水资源安全治理、国际水法和水资源争端解决机制、水—粮食—能源关联研究等仍将是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热点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双重叠加背景下,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因素交织联结,传统与非传统风险挑战加速积聚,水资源安全的研究维度将立体式拓展。除了现有的水冲突与水合作、周边和双边关系、国家安全、地区治理、外交政策、气候变化和国际法等研究视角外,学者们将在水与地区秩序和国际格局演变、大国水安全与全球战略、水问题与宗教种族议题、水问题与传统安全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联动性、水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加强探索性研究,同时寻求构建自然—人文—社会—政

治—安全耦合的水安全问题解决机制,也是研究的新议题和新动向。

第三,中国议题会更加引发关注。中国地处亚洲“水塔”位置,跨国界河流数量居全球第三位。中国水利发展规划中加大对跨国界河流水资源利用的计划,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解读中国水利开发的国际效应,将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议题。现在,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印度等周边国家的水资源安全问题已经不仅是双边或地区关系建构中遇到的问题,而且已经“卷入”到中美、中印大国竞争与制衡的博弈之中。所以,从水资源安全视角研究中国国家和对外战略,会是很多国外学者的学术选择。

刘:中国加强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必要性有哪些?有哪些值得关注议题?

李:中国加强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第一,水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学和全球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型国家安全观,已经明确将资源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意味着资源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地位。随着近些年气候变化加剧了全球水资源的稀缺性危机,全球水资源供应的不均衡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不仅造成大量的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更对地缘政治、地区安全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国家、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研究水资源安全治理是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第二,中国是国际关系研究热点对象国。2010年后,中国对国内跨国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外水利投资力度不断增大,国际社会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水政策和水利投资动向,但并不普遍用“有色眼镜”看中国,臆造出中国“水霸权论”“大坝威胁论”等不客观和攻击性论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的良性国际关系建设。鉴于对中国水资源安全研究热度的持续存在和国际认知普遍偏颇的现实,中国应加强该课题的研究,创新中国水资源安全理论研究,以全面、客观、权威的研究成果“以正视听”,积极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使国际社会能够客观认知中国政策和行为。

第三,水资源安全已经成为大国亚太战略实施和制衡中国的重要议题。亚太地区水资源安全问题突出,国家之间的跨国界河流争端持续存在,对地缘政治环境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美西方国家积极介入亚太水资源安全事务,力图使其成为影响亚太地区事务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砝码。因此,研究西方大国的水资源安全战略,掌握其水外交实施内容和制衡中国路径,具有现实迫切性。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的水资源安全研究有五个方面的议题需要关注。第一,水安全理论研究。除了目前继续深化现有的水理论之外,还需要加强水

资源安全与国家战略、地缘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加强从政治、经济、安全等总体安全视角下的水资源安全理论建构,推动发展—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内在关系的相关理论发展,发展中国水安全外交理论;第二,水治理路径研究。加强水治理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路径与模式研究,寻求提升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水资源安全风险管控与国家、地区安全维护的路径与方法,尤其是重点研究在全球水治理领域中有更多中国作为与影响力;第三,现实性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加强亚太地区水资源安全问题的跟踪性研究,掌握其与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联动与转化现象,及时认知其对抗性、传导性、突发性等特征和显性威胁不断上升的趋势;第四,水安全战略研究。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其与权力政治结合的态势进一步明显,对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演变的影响大幅上升,为此,有必要加强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的水安全外交战略的全面研究;第五,强化中国研究视角。水资源安全要立足于中国立场与视角,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战略实施,将眼前的现实需求和长期的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集合起来,实现学术建设与服务政策的双重目标。

刘:中国在水资源安全研究方面应该采取哪些积极举措?

李:鉴于水资源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应借鉴国外学界的成功经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积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第一,加大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一方面,应在大学、科研院所等本科、研究生教学过程中,设置水资源安全等课程。根据本人访学经验和调研所知,在欧美很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都设置有水资源安全的相关课程,或者由本学校老师授课,或者聘请世界资源所等专门的水资源安全研究专家进行教授,从基础课程培养学生的议题认知力和兴趣度,为专业研究储备人才基础;另一方面,培训国际关系领域的水资源安全研究专业人才,并通过项目实施、基金支持、交换培养、学位论文撰写等方式支持其开展专业性的水资源安全研究。

第二,推动多学科合力研究平台与机制建设。水资源安全研究属于多学科、跨领域性研究,虽然是从国际关系视角来研究水资源安全研究,但仍需要水文学、水利科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基础支撑。因此,成立专门的水资源安全中心,建立综合性的研究平台,通过课题、项目、会议和论坛等方式,汇聚不同机构、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与机制化信息交流,建立起跨机构、跨学科、跨界别的研究团队,形成研究合力和优势互补,以促进更多创新性成果出现。

第三,促进国内官、产、学一条龙合作模式。水资源安全研究包括全球、国

家、地方、个人等多层面,涉及政府、企业、科研等多行业,对此可以积极开展国家决策层、地方政府、企业界与投资者、科研机构、智库之间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对接与合作,鼓励研究者更加清晰、深刻地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企业的实际需求和政策导向,为国家决策者和政策界提供既具有全局和国际视野,又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咨询建议,提高决策的效率和精准度。企业、智库和科研机构等也可以充分发挥“第二轨道”外交者的角色,通过学术交流、政策对话、交流合作等方式积极宣传和阐释中国政策,加强中国国际形象的正面塑造。

第四,加强国际交流,扩大中国声音。要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开展与国外学术界、智库界和政策界的交流与对话,尤其是针对中国水资源安全相关议题,如国内水利开发、对外水利投资、与周边国家水资源争端等,要注重加强对中国相关水政策的宣传和阐释,第一时间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和无端指责,加大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力度。同时,由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重要智库对政府的相关水资源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加强与这些智库的交流。一方面,尽早掌握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趋势,为中国制定应对之策尽早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正面对其阐释中国政策和行为的目标、内容和意义,促使其客观认知中国政策和行为,以影响对方国家的涉中政策制定。